

从独占幻想到全球共享：奇点生产力加速的 资本主义总危机与中国希望*

高奇琦

【内容提要】 目前世界政治出现了两个显著现象，即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奇点生产力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运用基础之上的新型生产力。按照美国精英的构想，其应当被设定为一种锁闭行为。这一行为终结了其传统的耗散结构，使得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可能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爆发。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创新责任就会变得更加重要。中国需要进一步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并使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产生某种共振效果，从而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封锁，并为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奇点生产力 资本主义总危机 ChatGPT 科技政治化

作者简介：高奇琦（1981-），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上海 201620）。

2022年年底，“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事件引发全球性关注。本文试图探寻这一事件背后更加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技术背后的核心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其所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生产力。美国在发展这种新型生产力的过程中，试图实现一种独占的愿望。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分析在新型生产力结构条件下资本主义新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首先，从目前作为复杂动荡变革期特点的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的现象入手来剖析美国对新型生产力的独占幻想。其次，将讨论这种独占幻想与美国一直宣扬的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再次，从哈维的时空修复策略出发来讨论资本主义可能面临的新危机。最后，从中国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出发，力图探讨新型生产力全球共享的可能路径。

一、科技政治化与半球化

当前世界政治进入复杂动荡变革期，并出现了两个显著现象。一是科技政治化。科技本身是非政治化的。近代以来的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一直在强调一种非政治化理念，即科学技术产生的成果要变成人类的共同成果，这样才能够为人类共同的进步提供支撑。不过，在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科技政治化的现象。例如，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的科技发展被美国看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的阶段性成果。

当苏联的太空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后，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然而，这样的事件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少数国家在竞争较为被动的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美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便存在一种内在的基本逻辑，即要避免科技的政治化。然而，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科技政治化事件与美国的自由主义逻辑存在严重的冲突与撕裂。这背后体现了美国所宣传的自由主义和其实际运行中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

马克思将科技看成生产力革命的最重要要素，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并在极大程度上改造了社会生活过程^①。这样，科技导致的生产力革命，最终会使人类进入世界历史，并最终使人类走向解放。然而，在实际的发展当中，由于垄断资本的出现，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②，这就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的出现。帝国主义政策会倾向于将科技作为其政治工具。或者说，其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控制较高的科技，从而控制对先进生产力的主导，而对先进生产力的控制是列宁所定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新的延伸^③。但马克思希望人类走向世界历史，因此对科技异化展开了强烈批判，这也是马克思科技审度的又一焦点问题^④。然而，在实际的发展中却出现了帝国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科技政治化就是垄断资本主义试图控制先进生产力的一次尝试。

当前的科技政治化出现了一系列表现。例如，美国动用行政权力直接把一些他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的科技公司列入负面清单或列为打击对象，并运用行政手段制定一系列打击他国先进科技公司的措施。再如，美国限制本国与他国正常的科技交流活动。科技政治化的高潮之一是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出台。美国政府对这一法案的延伸解读，要求美国公民不能为他国的芯片企业工作。而这一点与美国在立国之初建立的《权利法案》是完全冲突的。公民有自由的工作权，其可以自由选择为哪国工作，这是《权利法案》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美国却动用行政权力来限制美国公民的工作权，这是与美国长期的立国基础完全冲突的。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极为重视机器是否屈服于资本的价值增值逻辑，以及是否达成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然而，美国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造成就业的不断萎缩和收入的不断下降。当人们感知到科技对自身劳动的剥削逐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之后，就会爆发尖锐的反抗。换言之，科技政治化自开始服务于资本之时起，就将“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⑤。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性趋势。尽管在历史上也曾出现经济全球化的退潮，但是整体来看，人类社会不断从较小的共同体单元向更大的共同体单元集中。例如，人类社会在最早期往往以部落的形式运作，之后在部落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早期的国家形态^⑥。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之后，便形成了现在的主权国家。到目前为止，主权国家仍然是人类活动以及福祉依托的主要共同体形式。与此同时，人类一直在试图向更大的共同体形态（如全球共同体）去扩展。因此，自主权国家诞生以来的现代化历史，就可以被看成一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应该说，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国际社会缺乏全球层面的权威协调。国际协调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在联合国成立之后，这种全球的权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1页。

③ 列宁认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1页。

④ 马克思认为，科技本身并没有过错，但资本主义却将科技用来奴役工人，使它客观地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帮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⑥ 参见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形式就已经出现，尽管这样的权威形式还是一种相对较弱的存在。而人类历史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逐步加强全球政府的构建。因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改革仍然是大势所趋。

同时，由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同样是人类社会近几百年来重要客观趋势。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便出现了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即先发国家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与销售市场，便使那些传统意义的国家卷入了世界体系的整体化进程之中。这是资本对利润无限追逐的表现，为了获得更大的世界市场，资本“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的催生下出现的，即“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②。因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殖民化。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及蒸汽革命的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例如，众多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文献都会谈及在20世纪初期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程度，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其经济全球化的联系也在加强。关于这种内在联系的规律，恩格斯较早地判断出这种革命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因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③。

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同样表现出很强的帝国主义特征。但是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世界体系在殖民化和反殖民化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和冲突，并在20世纪中期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体系^④。这一新体系是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产物。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可以被看成前两次工业革命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内部不平衡引发的矛盾冲撞。换言之，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德国后来者居上的情形。因此，在英国和德国之间爆发了围绕先进生产力的争夺性战争。这实际上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进一步促使世界人民对战争进行反思，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当然，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在其建立之初，还带有明显的美国操纵的特征。例如，美国早期对联合国的操纵，以及像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服务于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美国霸权的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世界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⑤。从严格意义上讲，信息革命可以被分为计算机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互联网革命。而今天，世界处在移动互联网革命的末端。美国在信息革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尽管苏联和日本分别在不同时期对美国的信息革命主导权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但都并没有完全地撼动美国霸权地位。因此，在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中，美国是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美国自由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同时这种扩张帮助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打败了苏联。例如，美国推动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在中间地带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动改革的重要诱发因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④ 关于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相关研究可参见Duncan S. Bell, "History and Glob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Temporal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4, 2003; Jan N. Pieterse, "Periodizing Globalization: Histories of Globalization", *New Global Studies*, Vol. 6, No. 2, 2012.

⑤ 参见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简言之，在整个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中，美国与经济全球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其跨国公司的力量向全世界兜售其新自由主义理念和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之后达到高潮。典型的表现便是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表述^①。美国在成长为世界霸权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秉持的是孤立主义，其典型便是门罗主义。不过，美国在其整个历史中，能够不断吸收外来移民，这实际上使其价值观内在地具有一种开放性。而孤立主义则体现在其不太愿意卷入国际事务。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才更多地进入国际舞台，并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然而，这样的历史趋势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变。这里的重要历史关节点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特朗普政府复兴了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即减少对国外事务的参与）^②。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理念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却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某种收缩策略。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特朗普政府主张完全收缩到国内，而拜登政府则主张要收缩到美国的盟友体系。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小院高墙”战略。所谓“小院高墙”战略，即美国将核心技术放入“封闭院”中，从而采取更严密的对华封锁，而“小院”外的其他非核心技术美国则放松对华管制^③。无论战略划定的封锁范围有多大，战略本身的封闭取向实际上是与美国长期主张的自由主义理念完全相反的。拜登政府的政策可以用“半球化”来概括，即美国在其亲密的盟友体系中形成一个封闭性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对外部的成员完全不开放。这种“半球化”其实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虚幻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美国超越一国本身所建立的盟友体系，将特殊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相分离，并将其特殊利益伪装为一种虚幻的共同利益。同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④，以美国为首的“半球化”俱乐部才会采取这种与全体利益相脱离的虚幻共同体的形式。

科技政治化是西方帝国主义实施其政治霸权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希望人类走向开放的世界历史，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都达成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最终使得民族的产品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⑤。然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希望通过半球化的政策来锁闭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点也可以结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来思考。沃勒斯坦认为，在传统的世界体系之中会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划分^⑥。同时，中心和边缘之间还处在一种相对联通的结构。而西方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这种先进生产力的锁闭，力图实现一个发达的半球与不发达半球的隔离，这一点恰恰是通过对奇点生产力的控制来实现的。

简言之，美国当前推动的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都是与历史趋势相违背的政治行为，与其立国之后一直坚持的自由主义信条是完全冲突的。这样的行为对美国文化领导力的损伤极大。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初，曾经达到了文化领导力的最高峰。不过，与今天相比，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文化领导力的低谷时期。本文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既然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对美国文化领导力的影响如此恶劣，那为什么美国还要采取这样糟糕的政策？

①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武断且骄傲地指出，今后人类发展只能遵循唯一的正确之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86页。

② Paolo Galizzi, “International Trade: Isolationism, Trade Wars, & Trump”,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42, No. 5, 2019.

③ Zhi Yongbi, Yin Wenjing and Zhi Ran,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Vol. 10, No. 4, 2022.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⑥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47-357.

二、美国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

科技政治化和半全球化对美国有如此大的负面影响，而美国还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其根本原因是美国存在一种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

奇点 (Singularity) 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在这一点上，时空无限弯曲，而所有物理定律全部失效^①。而技术奇点则是指技术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超高速增长点。雷·库兹韦尔率先将奇点的概念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智能相结合将会产生技术奇点，其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高社会的总体生产力^②。笔者将这种生产力称为奇点生产力。这一概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具有内涵上的相通之处^③。与奇点生产力相对应的概念是传统生产力。奇点生产力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运用基础之上的新型生产力，而此前产生的生产力都可以被看成传统生产力。此前，传统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有其分工体系，其呈现为中心-边缘的结构^④。处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心的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为整个生产体系提供资本和高端技术。绝大多数的关键性创新都在中心区域产生，而边缘地区则作为商品的销售市场与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最终，这种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传统生产力的世界分工体系可以从中国案例中得到很好的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处在世界分工体系的边缘。中国通过参与世界分工，即通过对外来物件的加工及来料加工来参与到这一体系之中。中国也为世界分工体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便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参与世界分工的情况。后来，中国以劳动力为中心的模式在不断调整。伴随着一些剩余的出现，这些工厂逐步在产业中开始向上爬升，而一些技术密集型企业开始出现。这就使得中国从原先的边缘位置逐步向半中心位置转变。实际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经历从边缘向中心的一个转变过程，其通过一定的积累，在产业上不断向上爬升。只有达到一定的产业高度，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生产性剩余，也才能够为本国国民提供更多的福利。这些剩余会支撑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国家行列。因此，从世界体系理论的角度来讲，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从边缘不断向中心迈进的过程^⑥。

不过，这其中存在一种“剥削悖论”，即不发达国家为何要加入世界分工体系。加入世界分工体系，意味着一种被剥削的状态^⑦。在整个传统生产力的世界分工体系中，高价值的部分都被发达经济体拿去，而低收入国家只能通过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工作拿到非常微薄的利润。尤其在人工智能被逐渐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之后，机器对低收入国家劳动力的伤害愈加严重，这就是科技生产力

①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p. 49.

②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New York: Viking, 2005, pp. 21-30.

③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于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一词。相较本文所提出的“奇点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一词的外延更宽，其强调由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一切先进技术的应用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而“奇点生产力”一词则更多从人工智能革命的角度出发。参见《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9/10/c_1129855743.htm。

④ Elisabeth Gidengil,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Dependenc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No. 1, 1990.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⑥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中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边缘国家受制于中心。但是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有希望成长为中心国家，从而摆脱依附地位。参见卢光盛：《“边缘”何以走向“中心”：以东盟为例》，《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⑦ Benjamin Ferguson, “The Paradox of Exploitation”, *Erkenntnis*, Vol. 81, 2016.

的异化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转引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之言：“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① 那为何这些国家还要参与世界分工？这是因为这样的参与意味着一种希望。生产力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而技术存在一种学习效应。只有参与到实际分工中，才能够对新的技术有所了解，并掌握和学习这些技术。这里的“剥削悖论”就体现在，尽管这样的世界体系存在着剥削，但是这些国家还是愿意加入这样的世界体系。因为这其中可能会具有发展机会，即过去的被剥削可能会为未来的不被剥削做准备。一旦通过积累剩余并完成产业链的爬升之后，边缘国家就可以在产业结构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从而争取更多的剩余和分配，这便是未来的希望。

然而，这种希望可能会被奇点生产力的来临打断。作为奇点生产力的基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②。同时，生产过程对科学技术依赖程度的逐渐增加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此马克思同样作出了预判：“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③。这种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的生产力仍然是基于人的，技术是人的能力的一个延伸。而奇点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类人或“超人”的方式出现的。同时，与人相对缓慢的生产不同，奇点生产力所构造的新的“超人”，是通过算法、算力和数据来共同实现的。换言之，只要有这些硬件设施，就可以使其发挥出类似于传统上由许多人类个体来完成的生产力状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奇点生产力会产生巨大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即其会对传统的人类从事的工作岗位形成强的替代效应。这便是其中的破坏效应^④。创造性在于，其可以使得人类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提高，使得人类更加接近人类整体解放的可能。这一点无限接近于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状态，即“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⑤。

按照美国科技和产业精英的构想，未来的奇点生产力可以被设定为一种锁闭行为，即这样的生产力可能不再需要世界分工，其完全可以在高墙内完成。其原因则在于，这种异化的奇点生产力对效率的追求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渴望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奇点生产力创造的更高的生产效率正是资本所追逐的。因此，资本会对科学技术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青睐。这极为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⑥。这将很有可能导致资本和科学技术“携手而行”。这样的生产力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创业部分，另一部分是运行部分。创业部分主要由“科学家+创业者+资本”来共同实现，而运行部分则由“高级工程师+机器+资本”来构成。从构成内容来看，资本是核心。发达国家的资本是非常充裕的，而在创业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找到重要的科学进展。同时，要有创新性的企业家，将其转换为可以在实践中产生应用效果的商业项目。同时，从天使轮到A轮、B轮，资本在其中可以起到重要的创新创业孵化功能。此外，生产力同样要高度依赖某些物质载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8页。

④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首次清晰而系统地阐述了“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今天普遍译为“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创造性破坏指的是“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参见〔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来实现，因此运行就会变得至关重要。而这部分运行的核心是高级工程师。传统由产业工人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可以由机器来实现。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对重复和机械的人力劳动进行替代。因此，人工智能会出现在生产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当工作承担主体发生演变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机器体系”开始出现，机器具备了自己的灵魂，而工人逐步沦为工具^①。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这样的潜能，而“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便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展示。构成奇点生产力的核心是人工智能。而在这样的奇点生产力的设计中，并不需要大量的人，而需要少数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创业者。然而，如果奇点生产力按照这样的路径发展下去，那么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将走向更加极端的对立，即马克思所言：“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②此外，按照某些西方国家学者的讨论，未来的社会很可能会分化成有用阶层和无用阶层，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会沦为无用阶层。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未来简史》一书中，将其概括为“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赫拉利指出，一旦具备高度智能又无意识的算法承担了一切的工作，那么有意识的“人”还能做什么呢^③。赫拉利的悲观疑问在很大程度上与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讨论的“末等人”（last man）存在诸多相似之处^④。换言之，按照西方科技精英的概括，未来的奇点生产力很可能会变成由少数科技资本以及工程师的合作生产力。参与这种游戏的是少数的精英，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大众。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从这意义上讲，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都是类似于高墙的锁闭行为。当然，这样的高墙可能也会略微做些边界的拓展。例如，美国可能会把其亲密的盟友囊括进来，形成一种俱乐部体制。这一点也可以被概括为某种意义上的“科技价值观联盟”，即美国会把具有类似价值观的、科技领先的国家包含到这一俱乐部之中。同时，美国在这一俱乐部外围建立高墙^⑤。这种高墙一方面可以激发内部的相互合作，同时也可以防止奇点生产力向高墙外部扩散，从而使得西方永远处在世界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⑥那么高墙内的美国及其盟友，恰好可以利用少数精英对先进科技的掌控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依靠墙内各国的相互联系继续维持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还可能会完成一种新的叙事。例如，西方可能把自己描述成某种受害者。正是由于来自外部的某些意识形态威胁，使其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外部的“恶魔”^⑦。这样一种“恶魔”的隐喻，会为高墙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使得其锁闭行为更加符合高墙内国家的一种集体想象。

然而，这样的独占幻想却产生了众多的问题。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实际上处在一种生产和消费的共性状态。生产和消费原本处在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在现代化的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所以生产比消费更加重要。然而，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之后，社会的特征更

① 马克思通过转引安德鲁·尤尔的话来表明，在机器体系中，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机器凭借在自身中发挥作用的力学规律使自身具有灵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页。

③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76页。

④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提出的“末等人”概念，反映了一种丧失超越性的价值观。奉行这种价值观的个体不再去追求进步和实现自我超越。参见[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页。

⑤ 参见周琪：《美国对中国科技“脱钩”的战略动机及政策措施》，《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8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⑦ Colette S. Vogeler and Nils C. Bandelow, “Devil Shift und Angel Shift in Eskalierten Politischen Konflikten am Beispiel Von Stuttgart 21”, *Z Politikwiss*, Vol. 26, 2016.

多表现为一种消费社会，即消费牵引的社会。让·鲍德里亚充分地讨论了消费社会的来临。鲍德里亚指出，当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后，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主要是无限生产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成为引导生产的主要推手^①。换言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下，会存在一种卖方市场。而在生产力较发达的状态下，其实存在的更多是一种买方市场。进一步讲，未来社会更大的话语权是由消费来决定的，即消费决定生产。因此，当西方的某些科技精英试图把整个奇点生产力以“小院高墙”的形式锁闭起来的时候，其同样会产生对消费市场的锁闭。

三、美国的堕落：从开放社会到封闭社会

开放曾经是美国的典型标识，其内含在美国的自由主义理想结构之中。然而，近期的一系列表现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的破灭。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观点，曾经的美国是典型的开放社会^②。在反对归纳的基础之上，波普尔强调开放社会的意义。在波普尔看来，归纳法是一种典型的机械方法。他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批判道，以杜克海姆为代表的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分析必须以实在的社会集团为根据的观点是机械的教条主义。因此，真正的科学理论无法通过归纳来产生，而需要一种猜想^③。因此，在笔者看来，只有通过猜想与反驳的过程，才能够得到那些更具创新性的科学理论。在这里，猜想其实蕴含了一种概率性的、反常规的潜能。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归纳逻辑。通过对历史的总结来得出未来的某种可能性，这便是历史主义的基本逻辑。波普尔总结了几类历史主义，包括神学的历史主义、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心灵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经济主义的历史主义^④。波普尔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那么就会对未来的跃迁可能性产生限制和遏阻。因此，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就是要不断用猜想、可能性设计和社会创新来为整个社会找到一种新的动力。对于波普尔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结合非平衡态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来加以理解。

耗散结构所描述的是一种通过与周围不断交换物质和能量，来使得内部结构不断发展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与外部世界的交换^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对奇点生产力进行独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与外围环境发生了切割。其在锁闭奇点生产力的同时，也将自己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按照耗散结构的解释，这种隔离就使得外界不再能够供给一些新鲜的能量和材料，内部也无法将结构内的一些废品和残留物排除出去。这样的废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熵的载体。只有把熵排到外部世界，才能够形成内部的秩序。在耗散结构的讨论中，一个关键点是而非平衡态。要使得耗散结构出现，就要让这样的结构远离平衡态，或者至少是让它可以越过非平衡的线性区。例如，耗散结构中存在“贝纳德效应”，其内涵是，如果上下温差很小，那么就不会出现六角形的花纹。这意味着系统仍然处

① 参见〔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5-56页。

② 卡尔·波普尔认为，应该在理性批评和自由讨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开放社会能对思想自由和知识追求形成保护。可以使人恢复最初的本性，收获快乐和满足。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

③ 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7-328页。

④ 卡尔·波普尔在讨论历史主义时，指出历史主义的类别可以从有神论、自然主义、唯灵论、经济四个维度进行划分。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II. A Criticism of Historicist Methods", *Economica*, Vol. 11, No. 43, 1944.

⑤ Dilip K. Kondepudi, Benjamin D. Bari and James A. Dixon, "Dissipative Structures, Organisms and Evolution", *Entropy*, Vol. 22, No. 11, 2020.

在较为接近平衡态的状态。只有在温差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够出现“贝纳德对流”^①。

换言之，耗散结构的关键是要出现一种非平衡态。在热力学的讨论中，其中的核心是温度。如果将这一讨论放到奇点生产力的框架之中，则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把奇点生产力锁闭在其俱乐部的框架之下，就是一种平衡态。在这里，只有出现奇点生产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时，才会出现贝纳德对流。这种对流意味着，整个耗散结构会出现更多更充分的关于能量和熵的交流。中心可以从外部获得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从外界不断引入负熵流，同时内部产生的熵要不断地被排出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世界分工就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由于存在生产力水平的较大差异，这就使得这样的结构具备非平衡态，之后才会出现贝纳德对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贝纳德对流就体现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会涌入中心区域。中心区域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心区域还会把大量的熵增内容排除出去，包括大量的生活垃圾、社会矛盾以及知识性垃圾。因此，传统世界分工体系的意义就在于，其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不断从外部不发达区域获得新的能量并酝酿新的变化。

与耗散结构相对应的是稳态结构。稳态结构是一种死亡结构，其不依赖于与外界的交换。“小院高墙”式的奇点生产力锁闭就是典型的稳态结构。尽管在这样的俱乐部之内，发达国家都处在一个相对高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其不存在生产力的差距，这就使得其处在一种稳态结构中，也就无法出现贝纳德对流。这也使其失去了与外部世界发生互动的新的可能性。美国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封闭行为和独占心理，根本原因是其害怕竞争。

然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同样需要认识到竞争对自身发展的助力。例如，在美苏充分竞争的背景之下，美国的许多科技成就得以完成。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登月。在美苏关于太空的竞赛中，美国被激发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从其现代化的过程来看，美国在早期更多表现为一种“强社会-弱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亚历西斯·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之中。托克维尔在书中曾指出，对于美国的一般民主而言，行政权虽然存在，但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②。由于美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原因，其与其他国家很少有战争冲突。因此，美国在某种意义上是天选之子，这就使其社会的自我组织性较强，同时其国家层面的动员能力较弱。在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的国家形态是弱分配体制。罗斯福新政可以被看成一个新的分水岭，在此之后才产生了较强的国家干预。同时，美苏冷战又成为美国加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外部背景。即便如此，美国的国家能力仍然没有欧洲那样强。其典型例证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中出现了国家回归学派，这一学派呼吁把国家找回来^③。斯蒂芬·斯科罗尼克在其《建构一个全新的美国国家》一书中曾言道，美国早期的历史并非没有国家，因为那时国家以一种特殊形式存在，并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④。因为从政治体制上来讲，美国更多体现为一种三权分立的结构，同时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国家回归学派呼吁更多从国家整体和国家能力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换

① 贝纳德对流又称贝纳德效应，是一种流体的自组织现象。即在贝纳德实验中，如果从底部加热金属板上的流体薄层，加热起初只有微观热传导而宏观保持静止。但是，当温度梯度越过临界值时，流体上会出现宏观可见的对流图案。Eberhard Bodenschatz, Werner Pesch and Guenter Ahler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Rayleigh-Bénard Convection”, *Annual review of fluid mechanics*, Vol. 32, No. 1, 2000.

② 参见〔法〕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9页。

③ 关于美国政治学中出现的国家回归学派，应当从斯蒂芬·斯科罗尼克所著的《建构一个全新的美国国家》开始。后来1982年，西达·斯考切波等学者召开了一个名为“国家理论在当下研究中的应用”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找回国家》一书。该书主张以国家作为核心行动者，理解国家应该从国家本来的面目入手。上述学术活动标志着美国回归国家学派的诞生和成熟。Brian Balogh, “The State of the State among Historian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27, No. 3, 2003.

④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8.

言之，外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的内聚力增强，同时使其可以完成更高层次的科技成就。不过，美国在登月计划完成之后几十年里，其并未再次重返月球，这是因为当时的竞争背景消失了。而要实现之前那样的成就，则需要一种外部环境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应该乐于看到在外部世界出现一个与其具有同等水平的竞争对手。

四、时空修复策略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美国出现的从开放社会到封闭社会的堕落，在本质上表现为自由主义的危机。大卫·哈维曾经讨论过资本主义的三块危机。在哈维看来，由于其不均衡的地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三块危机。第一块危机是产业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其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丧失和过度积累。为应对第一块危机，资本主义所采取的策略是时间修复方案，即通过大规模投资固定资本以及消费基金，使得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时间修复方案使得危机以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方式得以延迟^①。然而，延迟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最终仍然会出现第二块危机，即信用货币和金融体系仍然会以危机的方式呈现。这时，资本则不得不通过空间修复来缓解危机。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都是资本的全球空间修复方案，即通过资本向不发达区域的流动，从而减缓危机^②。然而，这样的危机也并不是可以最终避免的。资本的全球性地域扩张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不均衡的趋势，最终在实际上又加重了世界性的系统危机。尽管出现了空间修复方案，但是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流动过程当中，最终又使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从不发达区域流回到发达区域。这便是资本的第三块危机。

哈维的三块危机和时间、空间修复方案，较为宏阔地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哈维实际上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在下降，使得资本进一步金融化。只有金融化才能获得高额的利润，然而某些国家最终却丧失了制造业。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就思考过这个问题，“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③。同时，在空间修复方案中，世界的其他地区被进一步卷入世界体系之中。哈维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危机的延后。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出时间和空间的修复方案，但这些方案并不能完全解决危机，而只能延缓危机。延缓的危机最终往往又以更大程度的危机形式爆发出来。在时间修复方案中，更大的危机表现为金融危机。这一点在2008年的次贷危机里集中地表现出来。

从哈维的观点来看，奇点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完全拯救危机。尽管奇点生产力是一种更高维的生产力，其更具备先进性，然而，这种高维生产力的内在张力在于其放弃了人的生产。这其中就存在一种科技幻想，即用科技的生产来代替人的生产，但是“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④。而这可能会导致如下两大问题。

① 参见〔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11-331页。

② 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借用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的表述阐明了资本主义全球掠夺的原因。他指出，资本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多的创造利益的空间。对于资本家而言，从其他偏远的地方掠夺资源要比对抗国内的其他资产阶级力量更容易得多。因此，向不发达地区的资本移动成为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方案。参见〔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5页。

第一，本末倒置。奇点生产力作为高维生产力的本质应该是解放人，而不是替代人。解放人的意义在于，给予个体更多的时间。这样，原先被大量用来从事重复劳动来维持自身存在的劳动者，就可以变成哈维意义上的“建筑师”，其可以更多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活动^①。甚至，这样的“建筑师”可以成为一种“反叛的建筑师”，其能够运用某种反思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创新。而替代人背后的基本逻辑却是精英主义或是超人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少数“超人”可以改变世界，而其他人都只是尼采意义上的“末等人”。这种替代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末等人的集体反抗和社会撕裂。实际上，赫拉利就将这类被剥削的群体看成是改变未来的重要主体，其中便蕴含了这样的一层含义。

第二，加速挤兑。科技生产更加明显的特征是加速。这是西方一系列加速主义讨论的基本出发点。例如，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加速主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因此，人们不仅无需抵制所有的新兴技术，反而应当加速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建立一个超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②。而加速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应对问题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体有充足的时间，其往往可以拿出较为缓和性的方案。然而，在加速的背景之下，许多矛盾会集中地爆发，这实际上会加速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一些加速主义思想家之所以强调这样一种加速，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内涵。

在这里，需要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论述。二者处于辩证的运动之中。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当生产关系严重不符合生产力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剧烈的危机^③。因此，对于这样的奇点生产力，其本身就要求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进一步讲，生产关系决定着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一点，制度经济学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其认为外部制度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④。换言之，在新的奇点生产力背景之下，如何形成新型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生产关系，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奇点生产力而言，匹配的生产关系的核心，应该体现在自由人的生产与合作之上。

奇点生产力的本质是解放人，即这会让人们有更多的充足时间。另外，生产关系需要为之匹配。先进的生产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这需要社会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调节来加以应对。然而，当西方更多地投入到“小院高墙”的俱乐部体制之中，其便丧失了与外界进行大量资源交换的机会。这使得其从外界获取能量的能力也会下降。换言之，之前由于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控制，全世界人民产生的剩余可以通过不平等的分配和交换方式，大量地存留到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美国可以通过这样的再分配，使得本国人民更加满意。换言之，世界各国人民的辛勤劳作保障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福利。然而，一旦进入这样的半封闭体系，美国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和剩余的能力就会下降。那么，其分配给本国人民的资源总量也会下降，再加上由先进生产力所导致的替代效应，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矛盾。在原先的耗散结构下，这样的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与外部的交换向外转移。然而，在“小院高墙”的封闭体系之内，这样的矛盾只能内部消化，这势必会加剧先进生

① 大卫·哈维指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特定生物物种，具有六种专有的基本能力，包括“生存竞争和斗争、适应生态环境、协作合作和互助、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安排时间秩序”。人类可借用这六种专有的基本能力，产生出人类社会各种复杂的基本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参见〔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

②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 355.

③ 马克思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④ Kudit Kozenkow,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Foundations and Latest Trends”, *Society and Economy*, Vol. 35, No. 1, 2013.

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张。

换言之，奇点生产力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革命性和颠覆性的效应。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这同样会产生重大的革命性后果。之前，发达国家在应对这样的革命性技术时，往往会通过其耗散体系，将矛盾向外转移。然而，美国近期的封闭行为似乎终结了这样的耗散结构，最终会使得先进生产力带来的社会矛盾停留在其“小院高墙”之内。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可能会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爆发。这种总危机从根本上表现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

五、奇点生产力的全球共享：打破资本主义体系

要打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关键要打破西方力图独占奇点生产力的幻想。这使得中国具有重要的创新责任，也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掌握奇点生产力，不断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而创新的前提是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中国则需要在此基础上以更加开放的创新生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正如习近平曾多次在讲话中明确表示的，“科学技术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①。因而我们“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②。

人工智能是奇点生产力的核心。例如，就近期形成奇点创新效应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而言，其实质是一种通用大模型。而在这一技术上，其典型的特征是美国处于技术的超级状态。一方面，美国的超强优势体现在其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超级定义权上。人工智能的发展目前处在第三波的阶段，而在这第三波中，出现了两次奇点创新：一是2016年谷歌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的重大突破，二是2022年底由“开放人工智能”（OpenAI）发布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另一方面，美国的超强优势体现在其可以通过灵活的机制，不断走到世界的最前沿。例如，在“阿尔法围棋”的重大突破中，体现出一种兼并式创新。开发“阿尔法围棋”的“深度思维”（DeepMind）公司最初是一家英国公司。谷歌在对这一公司进行兼并之后，将其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突破力量加以培养，并且“阿尔法围棋”近年来在一系列领域都出现了重大创新。“开放人工智能”所反映的则是体制外创新。“开放人工智能”本身是一家由山姆·阿特曼和埃隆·马斯克等人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其不需要考虑盈利的问题，而需要更多专注在源头式的原始创新上。通过与微软的合作，近年来“开放人工智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例如，其产品“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应该说代表的是一种体制外创新成果。换言之，这样的创新并不是由超级企业做出的。但同时，创新组织与超级企业又保持了某种合作关系，其出现是为了帮助超级企业微软打败另一超级企业谷歌。

换言之，在奇点生产力方面，美国仍然拥有极强的技术实力和机制创造力。通过科技和机制创新，其不断地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这一点在马斯克近年来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中同样可以得到体现。这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中国的科技创新更多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创新^③。其中，中国往往在某一领域确定一家代表性的企业，由这家企业来组织相关的科技创新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1页。

③ 有学者认为，法团主义在中国各个行业十分盛行，他们认为，20世纪“亚洲四小龙”和时下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内部的法团主义体制密不可分。在这个体制下，国家和企业通过有组织的共识和合作，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可以朝着国家希望的目标和方向大步迈进。Christoph Lattemann and Wenxian Zhang, “China’s Appetite for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Profits, and the Necessity for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Sty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Vol. 10, No. 2, 2015.

动。并且，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该企业的创新性活动，往往给予一定程度的外部支持。这种做法既符合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①，同时，这种法团主义创新也避免了不同的企业把重复的资源投到相同的领域中，即避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盲目性，而更多体现为一种组织性。

然而，其中的困难在于，这种组织性似乎也在降低科技创新的潜能，因为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并不是在有组织的环境下诞生的。真正的创造性想法往往是少数。例如，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其核心观点与当时主流学术界是完全相反的。然而，科学的发展证明了爱因斯坦是正确的。正是基于此，波普尔才提出了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发现规律^②。因此，有组织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原始创新的产生。另外，那些被确定为具有引领性功能的组织，有可能会逐渐演变为寡头性组织。换言之，由于其可以固定地从国家得到专属性的利益，因此其可能对市场的变化丧失敏感性。质言之，由于外部奖励性租金的存在，重要头部企业减弱了在市场活动中寻求更多租金的动机。

在资本主义可能出现总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创新责任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习近平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③这就迫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换言之，一旦出现创新的时间窗口，我们希望真正的原始创新出现在中国，而非总是出现在美国。这样，才能够使得中国真正地掌握代表未来的奇点生产力。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构建适应奇点生产力的耗散结构。换言之，中国不能采取美国那样的“小院高墙”战略，而是要将奇点生产力作为改变世界的重要潜能工具，向发展中国家积极分享。对此，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曾表达过中国开放技术合作的决心和意志。例如，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中国将以此为契机，搭建平台和桥梁，向世界共享中国的技术发展成果^④。而从技术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改变世界的重要潜能。例如，其可以通过生产力革命，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丰富。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发展问题，可能会迎来最终的解决方案。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掌握奇点生产力，并逐步引导奇点生产力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形成新型的耗散结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就可以替代美国，成为开放社会的代表。近年来，中国推动的一系列重要的世界性倡议，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就反映了这种开放社会的特征。换言之，在新的奇点生产力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进一步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并使得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产生某种共振效果。这样就可以使得奇点生产力在中国引导的背景之下，形成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新型耗散结构。在这一耗散结构下，通过奇点生产力的全球共享，可以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封锁，不仅能为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发展赤字等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还能使全球国家间形成“合智”，携手应对人类社会日益严峻的各项全球性挑战^⑤。

① 参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年，第195页。

② Stefano Gattei, “Karl Popper’s 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71, No. 4, 2004.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01-202页。

④ 参见《习近平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04/content_5540725.htm。

⑤ 参见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

六、结 论

“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的出现可以被看成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奇点时刻。在“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系列产品的辅助之下，人类的生产力将获得极大的提高。正因为如此，美国产生了对奇点生产力的独占幻想，认为通过科技政治化和半球化的努力，就可以将这样的先进生产力锁闭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这种锁闭意味着美国不再希望通过传统的世界性分工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更加希望用一种价值观联盟的俱乐部体制来控制这样的先进生产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一种堕落，也背离了美国一直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在很大程度上从波普尔所强调的开放社会走向封闭社会。尽管奇点生产力的维系似乎确实可以通过机器自身的生产和少数精英来完成，然而这种封闭最终导致了一种死的平衡结构，即其由于不依赖于外部世界，也无法从外部引入负熵流，同时其内部不断增加的熵也无法排除出去，最后这样一个缺乏贝纳德对流的超稳态结构必然导致自身的失败。

用哈维的观点来看，美国一直在通过世界性的分工中的时间和空间修复来不断调节危机。尽管这些危机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是时间和空间修复确实大大增加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韧性和对危机应对的能力。然而，这种对奇点生产力的封闭幻想实际上是在放弃时空修复策略，并最终不可避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新危机。美国模式下的奇点生产力的本质不是解放人而是替代人，其最终目标是希望通过机器的生产来代替人的生产。并且，在加速主义的推动之下，新危机可能以一种快速且剧烈的方式较快到来。换言之，这种科技超级领先与社会极端撕裂之间会形成巨大的张力。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最终可能会将资本主义社会撕为碎片。中国在奇点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创新责任。我们同样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这样的奇点生产力，走到世界科技创新的最前沿。中国可以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形成开放性的耗散结构，并通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进一步实现奇点生产力的全球共享，使得先进生产力带来的收益为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民众所拥有，从而引导整个人类社会进入更加自由、开放和繁荣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 [2]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 [3] 胡莹：《数字帝国主义视阈下美国的数字霸权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 [4] 李妍：《知识垄断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以美国科技霸权为例》，《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编辑：张晓敏）